

# 全球治理研究的“重新定位”:在“局部全球化世界”探求“不全”的全球治理

庞中英\*

【内容摘要】在术语上,“全球治理”已经约定俗成,甚至被视为当然,鲜少被质疑。但是,在方法论上,至少有两个被忽视的全球治理研究问题有必要提出。在全球史等一些以“全球”开头的历史学科中,人们进一步回答了“(到底)什么是全球史”。受到“什么是全球史”的启发,本文在回答“(到底)什么是全球治理”时,认为“全球治理是否是全球的”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测度”在于诸地球层次对诸地球议题,例如气候变化的“治理”,人们过于关注“全的”全球治理而忽略了“不全”的全球治理。如同微观经济学区分“(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本文区分了“不全”的全球治理和“全”的全球治理,强调不能忽视常态全球治理的局部性,认为全球治理是一个从“不全”到“全”,然后再到“不全”的过程。全球治理在历史上的常态恰恰不是“全”的,而是“不全”的。如同其他任何事物,全球治理也有其“兴衰”和“衰兴”。本文围绕全球治理是否是“全球(的)”和全球治理的“全”和“不全”之转换,尝试提出一个作为“全球史”的全球治理史框架,以解释从19世纪初“欧洲音乐会”,即人们常常称为的“欧洲协调”以来的全球治理演化和当前全球治理遇到的一些根本挑战。

【关键词】全球史 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学科史 全球治理史

## 一、导论

在从“世界史(world history)”到“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学科转型中,随着“全球史”的复杂化,历史学面对着“到底什么是全球史”(what is global history)的困难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一些史学家做了严谨而深刻的研究。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历史学教授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于2008年出版了《什么是全球史》;<sup>①</sup>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历史学教授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也写过同一个题目。<sup>②</sup>

柯娇燕讨论了为什么要从“世界史”转到“全球史”。她在《什么是全球史》的中译本序中,强调了“全球史”为什么应该或者必须是“全球的”,而不是“世界的”以及“国际

\* 庞中英: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文科讲席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经济史, zhongyingpang@scu.edu.cn。

① Crossley, P. K. (2008). *What is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② Conrad, S. (2016). *What is Glob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的”。把“全球的”和人们熟悉的“世界的”和“国际的”区分开来，是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一书的主要贡献；超越甚至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史”。在“全球（经济）史”中最全面、最有影响、贡献最大的西方（德国）学者是弗兰克（Andre G. Frank）。20世纪90年代以来，弗兰克的代表性著述被介绍到中国。柯娇燕指出，弗兰克认为，欧洲（西方）的“‘世界’（world）一词并非必然是普世的，有时也可以意味着普世的对立面——地方”。所以，“有必要从（一种）‘世界史’的观点推进到（一种）更具有普遍性、包含内容更广泛的‘全球史’的观点。”“我们知道弗兰克不喜欢‘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这一词语，因为它暗指民族国家（the nation-state）在历史发展中是本质的或者决定性的单位。”<sup>①</sup>

从方法论（研究途径）的角度看，康拉德在同名的《什么是全球史》中指出，全球史是流行的“地球地思考（thinking globally）”的一种，是在历史研究上超越“欧洲（西方）中心主义”。与此同时，康拉德充分注意到“全球史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global history）”。

比之柯娇燕和康拉德，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EHESS）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双聘”全球史教授斯坦齐亚尼（Alessandro Stanziani）则把“欧洲中心主义”和“全球史的政治”两者结合起来。<sup>②</sup> 斯坦齐亚尼的代表作是《世界的交织：全球历史和全球思维（16-21世纪）》。<sup>③</sup>

为什么欧美的“全球史”学者注意和研究“全球史的政治”？笔者认为，他们指出了“全球史”的政治限度，即“全球史”真正超越“欧洲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等中心主义的困难。

笔者精心选择了柯娇燕、康拉德和斯坦奇亚尼三位杰出的“全球史”学者。其实，主要是因为她们（他）们为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全球的”学者确立了一个衡量是否是“全球史”的标准，即是否真正超越或者克服了根深蒂固的“欧洲和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其他的区域（国别）中心主义，以及这一标准的政治限高。

本文不是为了评论“全球史”研究界关于“什么是全球史”的讨论，而是借用包括柯娇燕、康拉德和斯坦齐亚尼等代表性学者的成就，提出为了促进中国的“全球治理研究”而提出的类似问题，即“（到底）什么是全球治理？”。换句话说，类似欧美的“全球史”，作为学科的“全球治理”的一个不能被绕开的问题也是为什么是“全球的”而不是“世界的”和“国际的”？进一步地，全球治理是全球的吗？为什么是全球的？如何是全球的？

本文不仅提到历史学/全球史学，而且要提到经济学（世界经济学）和政治学（国际关系学）。

在高度抽象的当代经济学中，竞争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sup>④</sup> 套用经济学的“全”和“不全”，全球治理是指在地球（诸）层次（global levels）“全”的治理吗？人们在强调（包括假定）和实践“全”的全球治理，如联合国组织的以联合国赋予合法性/正当性的气候变化治理，是人类全球治理史上规模最大的，几乎是“全”的全球治理时，是

① 柯娇燕（2008）：《什么是全球史》，刘文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II页。

② Stanziani, A. (2018). *Eurocentrism and the Politics of Global Hist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③ 斯坦齐亚尼（2024）：《世界的交织：全球历史和全球思维（16-21世纪）》，马秀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④ 萨缪尔逊、诺德豪斯（2010）：“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载于《经济学》（上册、第19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不是忽视了“不全”的全球治理？笔者区分了“全”的全球治理和“不全”的全球治理，尽管这样表述存在中文行文上的困难，但是，这个困难不是笔者造成的，而是因为我们把 global governance 早已翻译为“全”开头的政治和经济的或“政治经济”的术语。

在政治学中，似乎从一开始对 globalization 的看法要比其他学科更奉行谨慎主义和现实主义。这里说的“一开始”指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 globalization 的概念产生，<sup>①</sup> 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globalization 被转变为一些国家的公共政策（尤其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1999–2000 年，时任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的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当选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会长/主席。他在 2000 年的就职演说中谈论的就是当时时髦的“治理（governance）”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不过，基欧汉给 globalization 一词前面加了一个大的限定“（在）局部世界”。<sup>②</sup> 对基欧汉的“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多年来，笔者一直忘不了。当基欧汉的这个演讲有了中译版，<sup>③</sup> 笔者觉得中译文“局部全球化”是个有趣的理解。因为，一方面是“局部的”，另一方面又是“全球化”，就构成了一个悖论。后来，笔者认为，partially globalized 可能译为“局部地球化”更确切。不过，真正把 globalization 或者 globalized 翻译为“地球化”是近几年的事。一方面，把 globalization 继续理解为“全球化”，但另一方面，认为“全球化”仅是地球化的一种情况、一个类型、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地球化如果是一个周期的话，它的一个时期或者阶段可能是“全球化”，而在其他时期地球化则是“不全的”地球化。<sup>④</sup>

总结一下，历史学建立了到底什么是“全球史”的一个关键标准；经济学在区分“竞争市场”时贡献了“全”和“不全”的假定，这意味着 globalization 也有“全”的 globalization 和“不全”的 globalization；而政治学指出了“全球化”的局部性。来自上述三大学科的某些进展都促使笔者不得不重新认识我们习以为常的“全球”“全球化”和“全球治理”。

本文提出“全球治理是全球的吗？”的问题并对全球治理的“全”和“不全”进行讨论，试图提供一个新的全球治理史（The history of global governance）。在全球治理研究中，全球治理史（包括全球治理思想史和学科史）是必要的。至少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们对全球治理做了各方面、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现在是到了建构（书写）各种全球治理史的时候了。考虑到缺少“从中国出发”<sup>⑤</sup> 的各种全球治理史，本文提供全球治理史的（一个）参考思路或者框架：一个全球治理的（较）长历史。<sup>⑥</sup> 这个（较）长历史是从 19 世纪初到今天，时间超过 200 年，即两个世纪。

## 二、到底什么是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是全球的吗？

笔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研究全球治理，到今天，这一研究已有 30 年了。由于专业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对全球治理的研究，逐渐进入了世界史（全球史）和相关的思想史

① 时任《哈佛商业评论》主编的“营销学大师”莱维特（Theodore Levitt）的《诸市场的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一文（《哈佛商业评论》，1993 年 5 月）被公认为是当代“全球化”一词最早的出处。

② Keohane, R. O. (2001).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5 (1), 1–13.

③ 门洪华（2004）：“罗伯特·基欧汉学术思想述评”，载于《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罗伯特·基欧汉著、门洪华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④ 庞中英（2025）：“地球化的周期”，载于《全球化史十二讲》，北京：中译出版社。

⑤ “从中国出发”一语源于葛兆光（2024）：《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⑥ “长历史”是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等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École des Annales）”的概念。

等领域。写下这个题目，不是因为不了解全球治理的已有定义，而是对已有全球治理的定义或理解不满意。

柯娇燕等学者经历了她（他）们西方的“全球史”学科的兴起（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其提出的“什么是全球史”问题实际上具有高度的批判性（critical）。中国学者可以“（到底）什么是全球治理”为题反思和重思全球治理研究。

如果学科之间进行比较和相互支持，现有的关于“什么是全球治理”的文献，缺少类似历史学的“全球史”般的讨论，尽管在全球治理（学科）中，都要交代全球治理的定义。全球治理是全球的吗（Is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实际上，其他人早已问过这样的问题了。例如，有欧洲学者提出：全球治理中的“全球”和“治理”各自（到底）是什么？<sup>①</sup>

如果按照是否超越了“欧洲（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史”标准来衡量，笔者可以肯定地说，现存的全球治理和过去的全球治理，并不是全球的。全球治理的起源（origins）被公认为是欧洲。

在实践方面，我们都知道，在世界和平和战争——“国际安全”领域，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只有中国不是欧洲和西方国家。苏联和苏联的主要继承国俄罗斯联邦也是一个欧洲国家，而且在冷战结束后直到2014年，与西方七国集团（G7）组成了八国集团（G8）。在主要的“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组织中，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自1945年成立以来的80年，没有一位来自非欧、非美、非西方的总干事或者行长。

从思想史和学科史看，“全球”开头的一系列概念，包括“全球治理”，都是欧洲和西方概念。不是打上“全球”字样，或者号称“全球（的）”就一定是“全球的”。

到底什么是“全球的”？有的学者认为，只要某个国际安排（国际组织、国际制度）中包括非西方国家，例如有中国等“非西方”（non-West）国家行动者（the state actor）参加，就是全球的。在学科上也是这样，只要有（来自）非西方的研究，相关学科就是“全球的”。<sup>②</sup>

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名为“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的“跨国”或者“国际”的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包括了来自非西方的委员（包括中国委员钱嘉东大使）。这是一个较早的“什么是全球的”案例。经过两年的讨论，“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题为《天涯成比邻：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报告，轰动一时。直到今天，该报告都被称作“全球治理”的开创性文献。30年来，世界各地的人们对其引用太多。这里特别提醒一下该报告题目中的“我们的”一词。“我们的”这一点并不为人们所强调。

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的副标题是“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的起源”（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1945年，《联合国宪章》则以“我（们）联合国人民（we the peo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开始。80年来，世界上的人们总是援引《联合国宪章》的“我们的”模式。这里我想指出，“我们的”可以理解为“全球的”。

① 克劳斯·丁沃斯、菲利普·帕特伯格（2013）：“如何‘全球’与为何‘治理’？全球治理概念的盲点与矛盾”，《国外理论动态》，晓谢译，第1期，第27-33页。

② 例如，极力模仿“全球史”的“全球的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就以是否有来自非西方（尤其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看成是否是“全球的”国际关系（研究）的根本标准。



全球治理研究的一位开创者、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森瑙（James Rosenau）曾建议世界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研究应该包括更多来自非西方的研究。<sup>①</sup>

但是，“我们的”回避了一个“全球治理的政治”问题，即回避了全球治理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

上述提到柯娇燕强调弗兰克，因为弗兰克试图“重新定位（reorient）”西方主导的“全球史”。<sup>②</sup> 弗兰克的“重新定位”是一个真正具有“全球（性）的”学科史意义的重大的颠覆性工作。柯娇燕也注意到了弗兰克的学科贡献，并对其进行了高度评价。可惜，弗兰克“重新定位”的信号在地球上有的地方，并未被充分理解。<sup>③</sup>

综上，如果从是否超越“欧洲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角度或者标准看，现有的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并非一定是“全球的”。

### 三、被过分强调的全球治理中的“全” 和被忽略的全球治理的“不全”

“全球（的）史”“全球治理”等以“全球（的）”开头的术语，至少从中文语言学和叙事学的角度，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在于其夸大性，“全球”意味着“整个地球的世界（the entire global world）”。实际上，中文的这种夸大性直接来自英文 global 等有关术语。也就是说，globe、global、globalization、global history 以及 global governance 等，都是夸大到“全”地球的想象。<sup>④</sup>

从谁在解决（包括“缓解”）“全球问题”或者从解决“全球问题”（进程）的参与者角度看，全球治理的“不全”是常态，是世界历史的多数情况，而“全”的情况并不多。有的号称是“全”的，一般是“奇迹”。进入 21 世纪后，确实发生了和存在“全”的全球治理情况。但承认“全（的）”全球治理并不意味着有理由忽视“不全（的）”全球治理。如果忽视“不全”的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研究就少了很多本该有的研究对象。

即使是“全的”的全球治理，实际上也是基欧汉说的“在局部全球化世界的治理”。

历史上，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联合国和联合国体系，具有复合性（complexities）和混合性（hybridities）以及包容性（inclusiveness）。但是，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能成为联合国成员的。“多边”不等于“全边”。

联合国一系列号称全球治理的进程，尤其是持续进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似乎是“全”的全球治理的一个主要案例。但是，越是如此“全”，实际结果越“不全”。这些“全”的“集体行动”，不可能免除“集体行动的难题”，而是具有最大

① 罗森瑙提出了建立“全球化研究网络”（GSN）。2004 年在英国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全球化和区域化研究中心（CSGR）举行的首届 GSN 会议上，罗森瑙发表了《全球化研究：成就和挑战》的基调演讲，参见 <https://warwick.ac.uk/fac/soc/pais/research/csg/csg-events/conferences/gsnconfprog04.pdf>。中国学者黄平、庞中英等受邀与会。对该会议的综述《全球化研究的过去和未来：一场多样性的对话》，参见 Scholte, J. A. (2004). Globalization studies past and future: A dialogue of diversity. *Globalizations*, 1 (1), 102–110.

② 弗兰克去世于 1998 年。他在世时，西方的“全球史”已经兴盛了 30 年。

③ 弗兰克的“ReOrient”，可以用中国成语“一语双关”解释，一是转向东方，二是重新定位。这是其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的主要研究目标和研究动机。不幸的是，该书中译本多被翻译为“白银资本”，即用“白银资本”替代了“重新定位”或者“转向东方”。

④ <https://www.britannica.com/dictionary/global>。

的、最复合的“集体行动的难题”。美国在两届特朗普政府下，于2017年和2025年两次退出UNFCCC。由于美国退出，UNFCCC的“全”性已经遭受重大打击。

美国退出现有的一些最“全”的全球治理机制，迫使人们普遍思考所谓“美国不参与或没有美国的全球多边合作体系”。<sup>①</sup>

不过，退一步说，假如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UNFCCC中，并签署、批准和执行《巴黎协定》，假如没有“最大经济体”（最大排放者）美国的退出，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BDR）”“国家自主贡献（NDCs）”<sup>②</sup>等“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基本规范就不会存在争执、不一致、冲突。因此从长期看，即使《巴黎协定》的目标实现，“全球气候治理”也不可能是“全”的。与其过分担心和寻求“没有美国”的替代性的多边合作，不如解决现有全球治理及其体系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把全球治理放对地方”，让“不全”的全球治理运转起来。<sup>③</sup>

基于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国际体系的各国“集体行动”，以应对“共同”的“全球问题”。这样想象的全球治理，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悖论：地球的人类（各国）造成了至少是“跨国”的“全球问题”，但解决“全球问题”的手段或者途径则仍然是传统的、“国际”的。国际意味的不仅是合作，还有冲突。各国对“全球问题”及其严重性的认识，应对全球问题在各国（广义）外交政策中的优先性，以及各国的“自主贡献”等都存在差异，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差异。

世界上存在各种“全球治理理论（global governance theories）”。这些全球治理理论之间的关系无非两种：一种是基于不同国家和国家所在地区的全球治理理论之间的“大合流（the great convergence）”，另一种是基于不同国家和国家所在地区的全球治理理论之间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大合流”意味着“全”的出现，而“大分流”则至少意味着“不全”。

#### 四、走向作为一个“全球史”的全球治理史？

接下来，笔者以是否是“全球的”和是否是“全”还是“不全”的全球治理提出一个“全球治理史”的概念。部分地，是关于全球治理研究的思想史和学科史，是通过部分提到的思想史和学科史以构建作为（一个）“全球史”的全球治理史。

19世纪初，欧洲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年）结束之前和结束之后，为了预防在欧洲再次爆发类似拿破仑战争的大战，诞生了后来被称为“各国之间的音乐会（concert of powers）”——“欧洲音乐会（concert of Europe）”的“集体外交”模式。<sup>④</sup>美国政治学者

①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r）指出：“从整体来说，美国已经退出了整个可持续发展议程”。参见《诺奖得主斯宾塞：未来或形成美国不参与的全球多边合作体系》，《财新网》，2025年5月17日。

②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convchinese.pdf>。

③ 全球治理研究的一个代表性学者是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这些年来，关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罗德里克最重要的一个建议是“把全球治理放对地方”。参见Rodrik, D. (2020). *Putting Global Governance in its place*.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Group. 我国《比较》杂志把罗德里克的文章翻译为《把全球治理放对地方》，参见《比较》第112辑，2021年3月。

④ “Concert of Powers”一般被翻译为“大国协调”，这个翻译是有问题的。长期以来，无论是“国际关系史”，还是“西方外交或者外交思想史”，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把Concert直接翻译为“音乐会”。一个例外是，陈乐民等主编（1995）的《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指出了1814–1815年举行的维也纳会议也是音乐会，见该书第82页。

梅铨 (Jennifer Mitzen) 将这个“音乐会”模式称作“全球治理”的第一个模式——“全球治理在 19 世纪的起源”。<sup>①</sup> 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 提出了关于全球治理起源的 (一个) 政治理论。不过, 这项关于全球治理的研究不能说是“全球的”, 而是典型的当代的“欧洲和西方中心”。

我们要肯定从“欧洲音乐会”开始构筑全球治理史。不仅是梅铨等研究者这样做, 魏思和威尔金森 (Thomas G. Weiss and Rorden Wilk), 这两位经常合作的全球治理学者在研究全球治理史方面取得不少进展, 他们也认为全球治理史是一个“两百年的历史”。<sup>②</sup> 不过, 西方研究者的两百年全球治理史, 由于其“欧洲和西方中心主义”, 恰恰还不是 (不一定是) 一个“全球史”。现在,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学者来说, 我们要超越“欧洲和西方中心主义”全球治理史。

我们不是要否定、甚至放弃这个西方学者发现和坚持的全球治理的欧洲起源, 而是为了对其进行真正的“全球史”的改造。不仅要看到“欧洲音乐会”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 而且要看到 19 世纪的非欧洲的世界, 同时发现已有的从非欧洲 (例如中国和非洲甚至美洲) 角度讨论“欧洲音乐会”的研究。此外, 建议挖掘更多的来自非西方的关于“欧洲音乐会”之全球治理及其起源的研究。

“百年和平”体现的是 19 世纪欧洲的“区域治理”。这个“区域治理”是“不全”的全球治理。欧洲“百年和平”为欧洲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形成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发挥了作用, 例如, 19 世纪“英国治下”的世界秩序 (Pax Britannica)。“英国治下”的世界秩序与今天说的全球治理存在本质的差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 1944 年, 主张国家干预市场的社会科学家波兰尼深入思考了这个“音乐会”及其代表的“国际体制 (international system)”为什么帮助缔造欧洲范围内的“百年和平” (1815–1914 年), 又为什么无法发挥作用避免“世界大战”。<sup>③</sup>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1914–1945 年), 世界不存在“全球治理”。《联合国宪章》指出, 1914–1945 年期间的 30 多年, “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在经济上, 这 30 多年, 一些国家, 如日本和苏联跻身“工业国家 (industrial countries)”。同时, 世界经济在一些地方, 尤其是美国, 发生“大危机”和“大萧条”。

为重建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而建立的国际联盟 (the league of nations) 是 200 多年来的全球治理史上的重要事件。在研究全球治理史时, 不能忽视国际联盟, 需要从“全球的”的角度看待国际联盟。笔者注意到, 近几年已有不少研究重新发现和反思国际联盟。<sup>④</sup>

其一, 对“音乐会”意义或者作用的肯定。从形式上, 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作为世界大会 (the world conference), 都是直接源自“欧洲音乐会”。如果不是延续到今天, 当今全球治理的起源之论就难以成立了。这一点类似于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于 1971 年, 但作为国际金融制度 (IFIs) 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仍然存在。而且, 当今的国际组织实际上“协奏着

① Mitzen, J. (2013). *Power in Concert: The Nine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Global Governa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② Murphy, C. N. (2015). The last two centuries of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Governance*, 21 (2), 189–196.

③ 波兰尼 1944 年出版的《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 开篇是关于“国际体制”的, 即波兰尼从“国际体制”开始研究他的“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的起源”。

④ Lopez-Claros, A., Dahl, A. L., & Groff, M. (2020). A history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Institut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0–64.

全球治理”。<sup>①</sup>

其二，理想的、想象的、成功的全球治理确实是各种行动者参与的“音乐会”。“音乐会”之隐喻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当今联合国主导的世界主要的全球治理进程，几乎都是采取 COP (convention/conference of parties) 模式。COP 指的是“缔约方会议”，是有关全球治理的“最高决策机构”。例如 UNFCCC 的 COP，这个国际法意义上的 COP 一词，就是起源于“欧洲音乐会”。

全球治理的“全”过程是“不全”的。这个“不全”性，不仅指不是“全(部)”的国际体系成员都参加，而且意味着这个过程与生俱来、难以克服的不完善、不完美、不健全、困难、危机、受限、局限等。在冷战结束后，似乎出现了全球治理史上前所未有的走向“全的”全球治理的历史性机会，而且出现了一系列在表象上前所未有的全球治理形式和内容。这可以叫作全球治理史上的最大“奇迹”。但是，这个“全的”全球治理“奇迹”维持的时间不长，在达到其某种意义上的“高峰”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仔细盘点，当代的“全球合作的成果乏善可陈”。<sup>②</sup> 我们的世界现在面对全球治理的“不全”状态，这种“不全”状态可能将在 21 世纪的剩下时间里持续，也可能经过巨大努力，走向某种新的“全的”全球治理。

所以，笔者将 200 多年的全球治理史称作一个从“不全”的全球治理到“全的”全球治理、从“全的”全球治理再到“不全”的全球治理的过程。按照本文提到的“全球史”标准，有的全球治理史并不是一种全球史。笔者提出的一个研究任务是：中国研究者的书写在性质上应是“全球史”的全球治理史。

## 五、结论

使用“全球史”“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等与“全球的”有关概念者，不少人认为人类进入了“全球的时代 (The global age)”。 “全球史”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概念则分别诞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真正的“全球的时代”的历史并不长。用“全球史”、“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解释世界历史，就是“用现在解释过去”。<sup>③</sup> 我们也可以“用过去解释现在”。<sup>④</sup> 全球化的历史源远流长，至少从人类进入“现代世界”起，“全球的时代”就开始了。我们既要“用现在解释过去”，又要“用过去解释现在”。

在中文世界，尽管研究“全球史”、“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等“全球(的)”打头的事物已经有 30 多年了，但人们仍然对“国际”、“世界”和“全球”三者不加区分。最重要的是，人们没有问为什么要谈的是“全球(的)”，而不是“世界”或者“国际”。

如果要命名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已经过去的这 30 多年，世界(包括国际关系、全球治理等)的一个突出特征，笔者的选择是“全球”以及与“全球”相关的一系列事物的出现。这些“全球”系列事物，与人们曾经熟悉的“世界”“国际”不是相互替代的。将它们混为一

<sup>①</sup> Abbott, K. W., Genschel, P., Snidal, D., & Zangl, B. (2015). Orchestrating global governance: From empirical findings to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Orchestrato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p>②</sup> 迈克尔祖恩 (2024):《全球治理理论》，董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 5 页。

<sup>③</sup> 费尔南·布罗代尔 (1969):《论历史》(上册)，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05 页。

<sup>④</sup> 费尔南·布罗代尔 (1969):《论历史》(上册)，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20 页。



谈，我们就失去了认识、把握过去 30 多年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机会。

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全球的时代”，不是从 1945 年开始，也不是从 1815 年开始，而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sup>①</sup>

现有的全球治理和全球治理史不仅不一定是全球的，而且不一定是全的。要说明的是，笔者没有否定和放弃“全球”及其系列概念，但这篇文章部分目的是为了指出，全球史研究、全球化研究、全球治理研究等全球研究，实际上只是对地球史、地球化、地球治理等的部分研究。全球化毕竟不等于地球化，全球化只是地球化的一种类型、一个时期；全球史只是地球史的一种类型、一个阶段（时期）。所以，关于中国“全球史”研究要开辟的地球史研究领域还有很多，“全球史”即使研究得差不多了，还有很多地球史问题没有研究。同理，全球化研究也是如此。全球化仅仅是地球化的一种类型、一个阶段（时期），我们关于 globalization 的未知远大于已知，我们也许只知“全”的“全球化”，而未知“不全”的“全球化”。全球治理仅是地球治理的一种类型、一个阶段（时期），我们关于地球治理的研究还可以开辟许多领域，尤其是研究“不全”的全球治理。

真正的全球治理是“全球的”，即超越某种、各种区域的中心主义的；真正的全球治理大多是“不全”的。在 21 世纪，我们看到，全球治理正在恢复其本性，尤其是“不全”性。面对“不全”的“全球治理”，我们能做的一件思想（思想史）的和学术（学科史）的事情是将 global governance 修改为立足大地（包括海洋和天空）的地球治理。当人们问到全球治理时，我们要自然地说，全球治理仅是地球治理的一部分，是地球治理的一种类型、一个阶段（历史时期）。而地球治理史如此复杂，包括了“全的”全球治理史。当然，“全”的全球治理史也许最为重要。

（责任编辑：马涛）

---

<sup>①</sup> 1993 年，在区域层次，欧洲共同体（The EC）“升级”为欧洲联盟（The EU）；在地球层面，以“国际”开头的国际组织少了一个，那就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而以“世界”开头的国际组织多了一个，那就是世界贸易组织（WTO）。